

日本、韩国的中国研究热点分析

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葛涛

【摘要】日本、韩国的中国研究历史悠久，素称发达。究其缘由，既有同为东亚国家的地缘因素，亦包括历史文化背景相似的人文原因。因此，日本、韩国的中国研究中，对于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占有了相当部分，而且具有较高的水准。这是日、韩中国学研究有别于欧美的重要特点之一。然而，除了传统领域之外，对于与时俱进的热点问题的研究，是日、韩中国学界的另一重要特点。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崛起、东亚及世界局势发生剧变的情况下。日、韩中国学界对于热点问题的持续追踪、关注、研究，具有鲜明的特征。首先，对中国社会发展态势的全面关注。两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、学者对于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、经济、国防、文化、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情况，均保持着高度关注，由此形成了对中国最新情况的整体把握与认知。其次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，探索热点问题。其中，既有较为纯粹的中国国内焦点问题，但更多的则是与日、韩密切相关的情况。例如中国外交、国防政策对两国安保形势的影响，中国经济走势对东亚经济复兴的决定性作用，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给日、韩造成的问题与机遇等。其三，日、韩两国的中国学热点问题，既有相同或类似的部分，也有大相径庭之处。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，是由于在对华关系上，两国国家利益的差异。探索、研究日、韩中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，对于把握东亚重要邻国对于我国的真实关切点，从而改善我国的周边外交环境、创造东亚和平具有重要意义。

关键词：中国研究热点、日本、韩国

当下的东亚国际社会环境，正经历着很大的变化。导致这种变化的最主要、最直接因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。中国的和平崛起，不可避免地给现存国际秩序带来了影响，而其所处的东亚地区，可谓首当其冲。中、日、韩、朝、蒙，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，构成了地缘意义上的东亚。其中，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在本地区的地位举足轻重，相互间关系非同一般，历史渊源与现实因素交织在一起，

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格局。目前，对于日、韩而言，发展与中国的全面关系已成为攸关本国前途命运的事项。而中、日、韩三国的合作，对于东亚未来的安全保障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，可谓至关重要。日、韩与中国关系的现状自有差别，各自从本国需要出发，对中国的期待、关注也大不相同。了解日、韩这两个重要邻邦对中国关注的重点，以及研究中国问题的热点，对于促进中日、中韩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，进而提升东亚地区的国际协作水平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。

一 日本研究中国的“热点”所在

中日关系自 2012 年 9 月日本政府实施钓鱼岛“国有化”以来，颇不顺畅，时起波澜。尤其自民主党下野，自民党上台、安倍晋三出任首相以来，更是因历史认识问题、谋求突破日本现行安保体制等，与中国关系呈现紧张态势。然而在新形势下，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实际上有增无减。日本素有深入、细致研究中国各方面情况的历史传统，且官方与民间并举，政界、商界、学界形成“三位一体”的格局，以包括政党、行政机构、企业、大学、新闻媒体、民间社团等不同背景形成的平台，发布、交流、探讨对于中国的最新研究心得。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热点，是以对两国关系的影响、即对日本国家利益的影响为出发点而形成的。

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在介绍与中国的关系时，列出的两大焦点为：一、钓鱼岛（日本称之为“尖閣諸島”），二、中日经济关系及中国经济。这是日本政府外交当局对华关注的热点所在。在钓鱼岛问题上，强调所谓“尖閣諸島”是日本固有领土，由日本实行有效统治，不存在主权争议。至于中国政府的立场，日本坚持认为自 1895 年至 1970 年，约 75 年间，中国政府并未对日本政府实际控制钓鱼岛提出任何异议。中日两国之间，也从未就钓鱼岛达成“搁置争议”的妥协或默契。日本外务省对于中日经济关系，则秉持以下基本认识：对于我国（日本），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；对于中国，来自我国的直接投资在各国中位居第二，在华日本企业的数量在各国企业中位居第一。日中之间的经济关系紧密，且相互依存。中国、日本分别为世界第二、第三经济大国，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对世界经济整体产生影响。我国作为对地区以及世界发展负有责任的国家，必须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关系，在经济方面，也推进“战略互惠关系”。外务省的有关部门对此专

门进行了分析、研究，并提出了报告。如中国·蒙古第二课的“中国经济形势与日中经济关系”（2013年11月），“围绕尖阁诸岛的形势（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其后）”（2013年11月），以及“中国的大气污染与外务省的应对”（2014年1月）等。

外务省发行的双月刊《外交》中涉及中国的内容，反映了日本政府当下对华关注的“热点”问题。以2014年至今发行的《外交》为例。2014年1月发行的第23期，刊登了“特别策划”栏目——“日本版NGC与中国的挑战”，包括六篇文章：“变化的战略环境——‘安保’与‘历史’混在的危险”（铃木美胜，时事通信解说委员）、“首任国家安保局长谷内访谈——以‘有志者事竟成’的精神应对”（谷内正太郎，国家安全保障局长）、“中国‘防空识别圈’的目的何在”（高原明生，东京大学教授）、“实践‘积极和平主义’不可欠缺的司令塔”（北冈伸一，国际大学校长、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）、“国家安全保障会议（日本版NGC）的结构与机能”（吉崎知典，防卫研究所理论研究部长）、“‘瞄准’日本的‘东海防空识别区’”（永岩俊道，双日综合研究所上席客座研究员、原航空自卫队空将）。2014年3月发行的第24期，刊登了“美中‘新型大国关系’的虚实与日本”（加藤洋一，朝日新闻編集委员）、“台湾政局与被‘新型大国关系’动摇的中台走向”（金子秀敏，每日新闻专门編集委员）。2014年5月发行的第25期，刊登了“中国‘沉默’的意味——试探以实力改变国境的底线”（三船惠美，驹泽大学教授）、“与挑战性的巨大国家——中国正面相对之前的一点思考”（铃木美胜，时事通信解说委员）。2014年7月发行的第26期，刊登了特集“历史上的战争 受到考验的外交”，其中有三篇关于中国：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——以改变现状为志向的国家德国与中国的类似性”（Jeremy Black，埃克赛特大学教授）、“与‘日清战争’对话——危机中的时代感觉与历史认识”（刘杰，早稻田大学教授）、“中国‘历史认识’的深层——历史的记忆：‘耻辱’的一个世纪”（汪铮，西东大学副教授）。该期的“特别策划”栏目为“中国膨胀：接受考验的安全保障”，包括六篇文章：“日中‘不信任连锁’中的安保战略风险”（铃木美胜，时事通信解说委员）、“安全保障的法律整治——一切从直面危机出发”（胜股秀通，读卖新闻调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员）、“南中国海风高浪急——用法治包围中国”（金田秀昭，冈崎研究所理事）、“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姿态与越南的

对应”（阮逢春，越南外交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）、“奥巴马所描绘的亚太秩序”（水本达也，时事通信华盛顿特派员）、“只依靠美国的时代已结束了”（顾德明，巴黎政治学院教授）。2014年9月发行的第27期，卷首登载了马丁·雅克的论文“崛起的中国被要求具有‘忍耐与慎重’”。该期的特集为“宣传、谍报：情报战的反面”，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关于中国的：“无法从宣传体制中蜕变的中国”（西茹，北海道大学副教授）、“中国的情报战——军方展开‘三战’的实际状况与特性”（茅原郁生，拓殖大学名誉教授）。“特别策划”栏目“持久战与瞬间的风险”中的四篇文章，皆论及中国海洋战略：“常在东海的瞬间风险”（铃木美胜，时事通信解说委员）、“海洋战略‘A2\AD’——中国的作战能力与目标”（吉原恒淑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）、“如何应对与宇宙·网络空间一体化的中国海洋战略”（冢本胜也，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官）、“警戒东海上空：突发冲突的危机与缓冲”（永岩俊道，双日综合研究所上席客座研究员、原航空自卫队空将）。该期“Viewpoints”栏目中有两篇文章论述了中国与韩、朝两国关系的现状：“站在岔道口的中韩关系”（川岛真，东京大学副教授）、“冷却的中朝关系的走向”（吉田健一，时事通信首尔特派员）。2014年11月发行的第28期中，“提言”栏目发表了原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的文章“于中日关系的迷雾中寻求真正的碧空”，“Viewpoints”栏目中刊登了神田外语大学教授兴相一郎所著“习近平体制与反腐败运动”。

2015年1月发行的第29期，特集“战后70年的构图：日本外交的‘生死’原点”中，刊登有“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深层——习近平领导层加强牵制日本的‘本意’”（城山英巳，时事通信北京特派员）、“日中关系——以‘和解与合作’作为战后70周年的主题”（高原明生，东京大学教授）两篇文章。该期“特别策划”栏目的题目为“中国式思考模式——习近平在想些什么？”，包括如下文章：“回归调停者缺位的大众‘独裁’的习近平”（铃木美胜，时事通信解说委员）、“‘毛泽东化’的习近平”（宋永毅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）、“中国：敌人如果软弱则与之一战”（村井友秀，防卫大学教授）、“向亚洲新经济秩序行动的中国”（吉冈桂子，朝日新闻編集委员）、“‘日中’、‘美中’首脑会谈的评价——华盛顿的冷淡目光”（水本达也，时事通信华盛顿特派员）。“Viewpoints”栏目则刊有“中俄蜜月说的虚实”（袴田茂树，新潟县立大学教授）。2015年3

月发行的第30期，其卷首论文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·怀特执笔的“澳洲不会为了日本而牺牲对华关系”。该期“特别策划”的题目为“战后70年 对我而言的战后史瞬间”，其中刊有“日中邦交正常化与大平正芳的觉醒”（铃木美胜，时事通信解说委员）。“Viewpoints”栏目则刊有“习近平政权下的言论统制”（阿古智子，东京大学副教授）。2015年5月发行的第31期，刊有“AIIB将考验中国作为大国的度量与器量”（柯隆，富士通总研）。2015年7月发行的第32期，特集为“战后70年：历史与外交”，其中刊有“日中和解反论——1955年与2015年的比较”（杨大庆，乔治华盛顿大学）；“FOCUS”专栏的题目为“经济外交的新局面”，内有“中国‘丝绸之路经济圈’的虚实”（朝日新闻）。2015年9月发行的第33期，特集为“积极和平主义与安全保障构想”，其中有“‘相互脆弱时代’的美、中、日关系”（迈克尔·欧汉伦，布鲁金斯研究所）、“试探美中协调的‘损益表’与危机管理”（詹姆斯·斯坦伯格，美国前副国务卿）。“TREND2015”栏目则刊有“台湾、香港的年轻人何为提出‘异议’？”（铃木玲子，每日新闻），“FOCUS”栏目刊有“日中关系：由对抗走向对话”（毛里和子，早稻田大学）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日本政府对华关注的重点，以及政界主流看待中国问题的热点所在。所谓“热点”，是立足于日本国家利益，并以此为基准予以衡量、划分的。从日本的角度出发，集结各界相关人士，对可能使中日关系产生严重问题、从而给日本国家利益带来损害的动向进行预估，并予以分析、研判，并提供对应方略。范围所涉，及于中国政治、外交、军事、经济、历史认识等诸多方面的最新重大动态。例如政治方面，就有对于十八大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执政思路、风格的揣测，以及中国大力推行反腐败的解读等。外交方面，关注的焦点自然首推中日关系，但中美关系、中俄关系，以及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韩国、朝鲜、蒙古的关系亦是关注重点。以中日关系而论，在极为关心中国是否有意改善两国关系的同时，以固有的立场密切关注中国在维护钓鱼岛、东海、南海主权方面采取的行动。军事方面，主要是关注东海局势，评估中日之间在东海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，进而引出对中国海洋战略的分析。经济方面，则主要对中国采取的重大国际经济战略性举措予以关注，研究可能对亚洲、乃至世界经济秩序造成的影响。例如中国发起倡议成立的亚投行、“一带一路”构想等。而中国的上述经济战略，

无疑将会对日本在亚洲、世界的经济地位产生较大的影响，直接关乎日本的海外经济利益。在历史认识方面，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，日本关注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及由此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冲击。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问题专家，大多为现职官僚、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、资深新闻媒体人士等。此外，一些知名海外专家的观点、建言，也颇受重视。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相关人士之间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及倾向性。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中国情况、中日关系现状的不同把握，而个人对于中国的感受、即感情因素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上述专家们所认知的中国热点问题，以及他们对此的建言献策，往往受到日本政界的重视，是执政党、国会、内阁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形成对华观点、制订涉及中国政策时的重要参考。鉴于中日关系是日本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，因此日本政客固然有为了推动实现国内施政目标而利用、炒作中日关系的动机，但总体上仍不得不谨慎从事，以免背上破坏日中关系、使日本国家利益受损的骂名，从而承担政治责任。

除了政界之外，财经界、学术界等领域从不同的关切出发，也都有各自研究中国问题的热点。除了外务省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情况外，日本各从事全球业务的大企业，也无不投入研究力量，对中国经济的最新变化、动态予以研究、解说，为日本企业在中国寻找商机、规避风险出谋划策。各大企业一般设有综合性研究机构，拥有高素质的研究人员，往往是优秀的民间智库。例如日本最大的智库——野村综合研究所（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, Ltd.）就是从野村证券公司的综合研究部门起步的。2002 年 7 月、10 月，野村综合研究所分别在上海、北京设立了有限公司。身处现场的研究人员，对中国经济的最新情况进行把握、分析，并迅速提出建议。例如野村综合研究所最新出版的年度调查报告《亚洲不动产市场 2015》（「アジアの不動産市場 2015」）中，就对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及未来走势进行了独到、深入的论述。又如 2015 年 8 月整理、公布的《第四届日中金融圆桌会议概要》（「第 4 回 日中金融円卓会合議事概要」），会议议题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现状、中日两国在对外资产・负债结构方面的比较、中国通过对外投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率改善、中国推进资本结算自由化的情况、从行业种类所见之中国对外投资特征等，还包括主题演讲、自由讨论。野村综合研究所关注的议题，反映了日本经济界视角里的中国经济热点问题。

民间学术团体对于中国热点问题的搜寻、探讨，往往是在一种更为自由的氛围中进行的。日本学者结社具有自由、松散的特点，奉行志同道合的原则，因此要准确予以掌握殊非易事。但是若干历史悠久、声誉卓著的学术社团却很具有代表性，往往反映了学术界的主流倾向。以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——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为例。该会成立于1951年6月，由有志于研究现代中国、现代亚洲的学者组成。宗旨在于促进学者间的交流、合作，推动学术进步。现任理事长为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。现代中国学会的简称“现中学会”在日本社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，这点是比较罕见的。

现代中国学会的成立，是日本学界对于中国革命胜利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“应激反应”。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研究倾向几经变迁，目前以重视实证为主。会员约700人，包括若干在日中国留学生及旅日中国学者。该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学术大会，2015年度全国学术大会于10月24日、25日举行。共通议题“考问日本的中国研究”包括4篇报告，分别为：“我的现代中国研究——挑战与‘神话’”（毛里和子，早稻田大学）、“日本的中国经济研究可否为世界的中国经济研究做出贡献？”（矢野刚，京都大学）、“日本有关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”（陈立行，关西学院大学）、“面临对象·方法扩散多样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——在战后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探索现在的课题”（宇野木洋，立命馆大学）。学会编辑、发行学术刊物《现代中国》（『現代中国』、年刊），每年不定期发行《学会通讯》。最新一期《现代中国》（89号）包括“特集”、“论文”、“研究笔记”、“书评”等主要栏目。本期特集为“中日关系思考”，包括三篇文章及两篇评论，文章分别为：“从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所见之日中关系”（大里浩秋，神奈川大学名誉教授）、“世界中的日中关系”（入江昭，哈佛大学名誉教授）、“从中国历史所见之日中关系”（狭间直树，京都大学名誉教授）。评论分别为：“从共通议题‘思考日中关系’得到的刺激性论点”（西村成雄，发送大学）、“围绕‘东亚同文书院’的一则轶事”（砂山幸雄，爱知大学）。论文包括4篇：“顾均正对美国科学幻想的接受——以‘在北极底下’为中心”（上原香，首都大学东京大学院）、“中国地方财政收支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”（王娜，中央大学大学院）、“苏联与‘和平解决’西安事变——从外务人民委员部资料所见中国‘抗日化’认识的形成过程”（松本和久，早稻田大学大学院）、“从《九尾龟》到《九

尾龟续集》——理想的‘英雄’与厌女癖的人物形象”（神谷麻理子，国士馆大学）。“研究笔记”刊登了“口述侵略者——张承志日本叙述的变迁”（许司未，一桥大学）。“书评”共有六篇：“小笠原强《日中战争时期汪精卫政权的政策开展与实态——以水利政策的开展为中心》”（广中一成，爱知大学）、“高原明生、丸川知雄、伊藤亚圣编《东大学塾 为了参加工作的人士而编写的现代中国讲义》”（佐佐木信彰，关西大学）、“城山拓也《中国现代主义的世界——1920、30年代上海的现实》”（铃木将久，一桥大学）、“陈凌红《日中演剧交流的诸相——近代中国演剧的成立》”（饭冢容，中央大学）、“吴茂松《现代中国的维权运动与国家》”（阿古智子，东京大学）、“武上真理子《科学之人孙文——思想史的考察》”（川尻文彦，爱知县立大学）。

学者之外，日本普通百姓也有自己关注的所谓中国“热点”问题。其关注所在，往往会通过报刊杂志、电视、广播等媒体得到表现。例如，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人数激增的话题。以及更为重要的：中国游客在日期间所展现的惊人消费能力。这方面的消息、评论，大量占据了日本媒体的报道空间。另一方面，日本作为一个西方国家，媒体、尤其是著名的传统媒体，一般均有深厚的背景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，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倾向。这种差异往往在媒体所持的立场上得到充分的体现，且各家媒体均力图用自己的立场引导、影响公众。例如《朝日新闻》素有“亲中大报”之称，而《产经新闻》则以保守的观点而闻名。两家报纸在对待中国的观点、态度上，可谓泾渭分明。《产经新闻》的中国报道，时常事关所谓“中国威胁”。例如中国海监船对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不定期巡航，被指为对日本领海、领土造成威胁；中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正当行为，则被污蔑为“试图用实力改变现有国际秩序”。除了传统媒体之外，随着网络空间的拓展，利用网络平台发表意见也成为日本社会生活的常态。日本网民在网络空间对中国所表达的意见、宣泄的情绪，也极易形成一时的中国“热点”。

二 方兴未艾之韩国研究中国“热”

中韩自1992年建立邦交以来，双边关系发展顺遂。尤其自中共“十八大”

召开、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，以及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以来，两国最高领导人频繁互访，政治、经济联系日益紧密，在国际舞台上互相配合的行动也更为常见了。

中韩关系形成如此局面，殊属不易。其中的根本原因，在于两国国内形势发展所造成的相互需要。韩国在经济、国家安全方面，已无法离开中国。目前，中韩贸易额已超过韩美、韩日贸易额的总和。2014年，中韩贸易额接近3000亿美元，其中韩国的顺差高达数百亿美元。对于经济持续低迷的韩国而言，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。在半岛的安全保障、实现无核化方面，中国作为与朝鲜半岛具有千年以上深厚历史渊源的地缘政治大国，所发挥的作用亦至关重要。所以，虽然有日本媒体评论朴槿惠政权的外交支柱是安保依赖美国、经济依赖中国，在中、美两大国之间搞平衡。但是实际情况则是：中国对于韩国安保所发挥的作用，虽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，却是极为重要、不容小觑的。在韩国方面看来，中国对韩国安全的影响，主要通过对半岛政策、尤其是对朝鲜的外交政策得以体现的。

因此，中国经济、中韩关系、中朝关系是韩国关注中国的“热点”。此外，由于两国各方面交往的深入发展，韩国社会对于中国社会多方面的情况均表示出较强兴趣，以及了解的愿望。除了中央政府部门如外交部、产业通商资源部、统一部等一如既往关注中国政、经、外交、国防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之外，商界、学界、媒体，甚至文化、演艺界等都从各自的关注出发，对中国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。由于以韩国时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“韩流”在中国大为流行，因此近来韩国社会颇为关注、研究中国的流行文化、时尚趋势，试图从中为韩国寻找新的商机，以及实践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的机遇。这种现状，为韩国的中国研究平添了亲和力，浓重的大众化氛围，以及一道绚丽的色彩。

以大学为中心，依托财团的资金支持，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，是近年来韩国开展中国研究的一大特色。一般来说，资金提供方并不干涉具体的研究主题。这种形式，促进了学界与财界的结合，一方面使研究人员可以依托研究机构这一平台充分开展学术活动，并在经费方面得到保障；同时也使财团可以获取自己亟需的中国研究信息，为战略决策服务。从长远看，这种形式对于提升韩国学界的中国研究水平，促进两国之间的互相理解，是大有裨益的。例如成立于2010年的韩国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，即由韩国研究财团提供运营、研究经费，依托国民大学所设立。其研究重点有二：一、现、当代中国的知识网络，二、当代

上海研究。尤其是关于当代上海的研究，可谓独树一帜。既开拓了韩国学界在中国研究中的一项新领域，又对这个当下中国研究的新热点做出了回应。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的当代上海研究，涉及上海网络社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、上海广播媒体的新特征、浦东社区开发、居民维权等诸多方面，已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，在韩国学界树立起了自己的地位。

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全面持续加强，韩国各界对于中国的关注无疑将继续深入，中国研究的热点也必然更为丰富多彩，研究水准也将进一步得到提高。

日本、韩国与中国同处东亚，互为重要邻邦。发展与日、韩的双边关系，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，堪称关系极其重大。因此，准确把握两国对中国现状的关注所在，可以成为预测、分析与判断其在对华关系方面将行举措的重要参考。当今世界格局风云变幻，合纵连横、远交近攻的国际政治剧目不断上演，在此背景下，对日、韩等重要邻邦对中国的真实心态尽可能做到心中有数，其意义显然不言而喻。日、韩与中国素有“同文同种”之称，这道出了两国与中国之间深厚的历史、文化渊源。直至今日，在两国的社会生活中，中国文明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。日、韩对待中国的心态，均建立在这种历史感情因素之上。近代之后，中国式微，日本崛起为世界列强，中国、韩国遭到其侵略、奴役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，日、韩、中三国相继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，中、日更是分列世界第二、第三大经济体。三国之间，现实的利益、矛盾错综纠结。以历史渊源为底色，以地缘、现实利益为基准，日、韩对于中国的关注热点，大率出于此。

因此日、韩虽然同为美国的军事盟邦，且依据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所言，日、韩是所谓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。但是两国与中国关系的现状却冷热不均，颇显异样。这于日、韩各自关注中国“热点”问题的差异中，可见一斑。探索、研究日、韩中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，对于把握东亚重要邻国对于我国的真实关切点，从而改善我国的周边外交环境、创造东亚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。